

計畫名稱：皇明經世文編研究

計畫編號：NSC88-2411-H-002-031

執行期限：1998年8月1日至1999年7月31日

主持人：鄭吉雄（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dcheng@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皇明經世文編》是明朝末年陳子龍（1608-1647）徐孚遠（1599-1665）和宋徵璧以及江蘇松江文士所編成的一部大型的文編，以「經世」為主題，以明朝開國以迄編輯當年計二百七十年（洪武元年[1368]-崇禎十一年[1638]）為斷限。全書凡五百零四卷，另補遺四卷，收錄文章三千二百餘篇。編輯時間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始，至同年十一月完成。

「經世」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海內外學術界包括文史哲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不但牽涉到明清學術思想的特質問題，更涉及中國文化思想的本質問題。明清兩朝有很多部《經世文編》，尤其清代，更有近二十部題為《經世文編》或以「經世」為主題的大型《文編》。《皇明經世文編》編訂於晚明，與清代的第一部《經世文編》（魏源、賀長齡編）遙遙相接。然而過去學術界使用《文編》來進行研究的很多，直接研究這些材料的則很少。本計劃旨在針對《皇明經世文編》本身，進行基礎性的研究，主要在透過直接的閱讀，來考察這批材料的結構、體例與本質等各方面，並進而了解它在近世經世思想史上的位置，及其對清代經世思潮的啟示作用。作為一個「基礎研究」，我們給整批材料描畫出一個基本線條架構，並指出其各方面的特質。換言之，讀者透過閱讀這篇成果報告，即可以大致上掌握《文編》的基本架構、體例、作者的資料、選文的寬嚴、編者的理念等。

二、Abstract

The 'Huang Ming jingshi wenbian' was an enormous prose collection with an amount of five hundred and eight volumes concerning "state-society servicing" (經世). These edited prose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bureaucrats from 1368 to 1638. Three scholars from the Jiangsu province, namely Chen Zi-lung, Xu Fu-yuan and Sung Zheng-bi edited the book. "Jing shi" was suppos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idea dominating the imperial China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17th century, and it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by scholar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After the publishing of the 'Huang Ming jingshi wenbian' in 1638, there were more than seventeen other prose collections, titled "jing shi", edited later in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Min-guo period (from 1826-1913).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Huang Ming jingshi wenbian' was actually an important model in the history of "jing shi" thought in China. Regretfully this five hundred volumes work has yet been studied as a whole piece. This research program is mainly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n this book b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texts. I will also attempt to trace the bibl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ll the authors appeared in the book.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are always signified by their achievements in philosophy. This study may help people know what they had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三、緣由與目的

《皇明經世文編》(以下簡稱《文編》)是明朝末年陳子龍(1608-1647)、徐孚遠(1599-1665)和宋徵璧(?-?)以及江蘇松江文士所編成的一部大型的文編,以「經世」為主題,以明朝開國以迄編輯當年計二百七十年(洪武元年[1368]-崇禎十一年[1638])為斷限。全書凡五百零四卷,另補遺四卷,收錄文章三千二百餘篇。編輯時間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始,同年十一月完成。《文編》蒐集了明朝學者士大夫討論政治、經濟、民生、軍事各方面問題的文章,內容較黃宗羲所輯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海》尚多二十六卷,而且主題明確,是研究明代經世思潮的重要文獻。過去超過十年,我從事「浙東學術」的研究。浙東學者特別喜歡講「經世」,而因此我對「經世」這個課題感到高度的興趣。為了探討清初浙東學者經世思想的源流,我有意上溯《文編》這部書。這是我提出本計劃的緣由之一。

過去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已經知道利用《文編》來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問題。如 Thomas Metzger(漢名:墨子刻)的論文“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利用《文編》來分析商業(commercial sector)與農業(agricultural sector)相互間的變化與消長,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許淑玲的論文《幾社及其經世思想》也利用《文編》討論了陳子龍等編者的經世思想以及《文編》所反映的晚明農業與社會階層變動的問題,他們都是利用《文編》來作「點」的研究而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知道並利用一批學術材料是一回事,真正了解材料的本質與特性,又是另一回事。舉例來說,我曾於1994-1995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訪問,研究該校東亞圖書館所藏的方志,發現半個世紀以來文史學界知道「方志」的重要性,利用「方志」材料檢索諸如人物傳記、地理數據等資料的人士很多,卻很少有人注意到「方志」中有許多錯誤、或至少偏差而不足取信的材料,因而在使用時,往往不懂得適當地淘汰與選取材料。方志和《文編》這一類大型的材料性質基本上是一樣的,若沒有基礎性的研究,也沒有基礎性的認識,等於完全不了解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與限制,試問又如何能夠甄別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材料呢?就《文編》而言,儘管學術界知道這一大批學術資料,也擷取了其中某些文章或題目,作了「點」的研究而取得成果,學術界未曾有人整體性地研究它的性質,卻也是事實。因此,將《文編》作全面性的考察與整理,以期對該書作為一個大型的資料庫,該如何去看待及利用,能有較全面及基礎性的了解,就是我提出本計劃的緣由之二。

為了有系統地分析這批材料,本計劃所做的工作,就步驟而言如下:

- 1.盡量閱讀全部資料。文義艱難或篇幅過長的文章,至少大略地讀過,以求有一個基本的印象。
- 2.盡量查出所有文章作者的名字、生卒年和主要活動年代,以求了解全書收錄文章的年代分佈。
- 3.參考原書卷末所附「分類目錄」,依照各個類別的文章,進行第二次的閱讀工作,尋找各類文集的特性,並與明朝的歷史發展狀況作基本的聯繫與比較。
- 4.舉辦小型研討會。先由主持人(我)提供相關參考資料以及研究進度心得,請參與的人員從各方面就《文編》本身以及「經世」的相關問題兩方面,提供意見。
- 5.1960年9月大陸學者陳乃乾等始編刊該《文編》時,已委朱士春協助編寫「分類

目錄」，等於粗略地區分了主題。本計劃也針對了其所收錄的主題，評析其選輯的標準以及收錄材料所反映的經世思想，從微觀的逐個主題的分析，進而採用宏觀的觀察，循序漸進地針對整部《文編》進行「基礎」的研究，探討該書對於「經世」的義界以及理念。

至於本計劃的目的，亦即我希望解答的問題，主要有四個：

1. 《文編》作為一批學術材料，在體例上有什麼特質？選文標準如何？作者的經世理念又如何？
2. 《文編》是否說明了明代學士大夫的經世思想？
3. 《文編》是否給予清代的經世思潮什麼啟示？
4. 我們是否能透過《皇明經世文編》重新探討明代學術思潮的特質與相關問題？

四、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所獲得的結果，以及針對上述四個問題的答案，計得十四點結論與討論內容，分列如下：

1. 在三位編者的生平方面，《明史》和《清史稿》是較易接觸到的基本材料，吳 影印經世文編序（以下簡稱吳 序）有簡略的介紹，許淑玲的論文較為詳細。我們盡量從各種記載，如《臺灣通史》《福建通志》《臺灣通志》《同安縣志》《金門志》《廈門志》等，也找到了一些補充性的資料。不過單就編者生平與《文編》的關係而論，值得注意的是，《文編》編訂於崇禎十一年，前一年陳子龍中進士，四年後徐孚遠中舉人，五年後宋徵璧中進士，可以理解，他們在編纂該書時政治歷練尚不足，亦未在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另方面，他們少年時和一般人一樣，都在準備科舉，長期間浸淫在八股文的訓練，在文學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聞名於鄉里。當時他們既非長期浸淫於經史典籍（像全祖望），也沒有跑遍大河南北的實務歷練（像顧炎武），這些背景實際上對他們在經世濟民相關問題的思考上，是有所限制的。我們基本上對編者應有這樣的認知與同情。
2. 在選文原則方面，吳 序列舉了「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等三點。事實上根據宋徵璧 凡例，印證全書所收錄的文章，我們仍須補充幾點：第一、《文編》選文原則有「寧濫毋缺」的傾向，凡與政治、社會、現實環境稍有關涉的文章都盡量收錄，不同意見的文章也並存。第二、作者有儲備資料、以「為國史之採擇」的意圖。第三、凡例以「立言之家」與「實用之準」並舉，實更重視立言，舉例來說，如明末軍餉浩大（尤其天啟以後的遼餉），礦稅不能不增，《文編》收錄了多篇請求停止礦稅的奏議，顯示請停礦稅雖沒有收到實際功效，編者卻刻意反映晚明國家經濟上這一個重要的問題。第四、不以人廢言，獲罪的士大夫的文章亦收錄。第五、有幾類的文章是編者特別重視收錄，如曾任首輔者（雄按：明朝的首輔，集中在世宗嘉靖以後。嘉靖以前，入值內閣參預機務的大學士權位未重，嘉靖年間始將班位列在六部之上，內閣大學士始稱首輔。但嘉靖四十五年間，凡任命七位首輔，顯示內閣本身的一種不穩定性）關於平定民變、議禮、農礦生產、馬政涉及軍事強弱的文章等，也都特別重視收錄。
3. 《文編》輯文有「前略後詳」的現象，即年代愈早者收錄得愈少，愈晚就愈多。綜觀全書，略依作者生卒年先後選錄其文集的文章。如卷六十一收錄余子俊《余

肅敏公文集》。余氏生於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卒於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是景泰二年（1451）進士，晚年以左都御史致仕卒，活動年代即自代宗景泰二年至孝宗弘治二年，恰是所謂明朝中葉的時期。因此，若大約以余子俊為分水嶺，《文編》卷一至卷六十，共計六十卷，收錄了明朝前半期的文章，而卷六十一至卷五百零八卷，共計四百四十七卷，則收錄了明朝後半期的文章。明朝前後兩期收錄的文章的比重大約是一比七。在全書的基本架構下，各大類以及大類下的各個子目所收錄的文章（類目採用朱士春所撰「分類目錄」，見《文編》卷末），自然也都有「前略後詳」的現象。我們試用卷六十為明朝前半期和後半期的分水嶺，以「政治」、「文教」、「武備」和「皇室」四大類分別來看，各舉一大類一子目以為例：「政治·職官」類：共有六十二篇文章。前半期四篇，後半期五十八篇。「文教·著作」類：共有六十一篇文章。前半期六篇，後半期五十五篇。「武備·馬政」類：共六十四篇文章。前半期一篇，後半期六十三篇。「皇室·宗藩」類：共五十九篇文章。前半期四篇，後半期五十五篇。上述這種情形一般是合符歷史現象的，因為隨著時間的遞進，朝代由盛轉衰，政治、經濟、農業各方面的問題愈多，政壇的爭論愈激烈，值得蒐錄的文章就愈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愈接近崇禎十一年（1644）的文章較易蒐羅的緣故。

4. 在《皇明經世文編》體例方面的缺點，吳 影印序 已經提出了三點，即「選文重複、斷限不嚴、有所顧忌」。其實，這三個缺失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吳氏所說的「編選時間過於短促」外，主要還是出在《文編》以「文集」而不以「主題」來作為單位。我們知道，黃宗羲《待訪錄》和顧炎《日知錄》都講經世，都是以問題為主，特別藉由篇名以將問題突顯出來。但是三位主編者限於背景與經歷不足，因而只好採用了較簡單的體例結構。另一方面，《文編》的結構比較鬆散，收錄了許多官僚習氣的文章，文章的內容與經世濟民沒有直接關係（舉例來說，編者在「凡例」中已表明特別重視張居正的文章，但卷 325 收錄張居正 番夷求貢疏，內容僅為呈報西藏僧人私餽禮物一事，既非真的求貢，與朝政、制度、政策亦無直接關係），顯示作者對於「經世」這個概念僅有粗略的認知，在編書時並沒有一個能呈現具體問題的方案。
5. 《文編》的編者在「以文集為單位」的體例約束下，也盡量突顯了若干的時代問題。例如宋徵璧《凡例》稱「北摧勁虜，則詳于王威寧」，王威寧即王越（1423-1498），曾任兵部尚書，總領大同兵務，封威寧伯。弘治十年（1497）總制寧夏甘涼軍務。檢《文編》卷六十九收錄王越的文章，其中就特別可以看出明朝中葉西北邊防軍務的問題。又如《凡例》說：「倭奴抄掠，則詳於胡少保、戚總戎、唐荊川。」胡少保即胡宗憲（1538-?），其文章見《文編》卷 265-267；戚總戎即戚繼（1528-1587），其文章見《文編》卷 346-350；唐荊川即唐順之（1507-1560），其文章見《文編》卷 259-261。換言之，關於十六世紀在中國為禍甚烈的倭寇問題，分別集中在胡、戚、唐三人共十一卷的文章中。《凡例》還指出：「南伐麓川，則詳于王靖遠；兩廣寇亂，則詳于韓襄毅；勦滅土達，綏戢荊襄，則詳于項襄毅；處置寧藩，詳于王文成；河套恢復，則詳于曾襄愍 順義封貢，則詳于王鑑川；平播則詳于李襄毅；水蘭地界，則詳于郭青螺；西征則詳于梅客生；東征則詳于宋桐岡；若經略奴酋，則詳于熊芝岡；撫賞插部，則詳于王霽宇；水西本末，則詳于朱恆岳。」《凡例》特別作了這一類的提示，表示他們在「以文集為單位」的

結構中，也注意到藉由特定人物的文集去突顯特殊的歷史問題。

6. 《文編》以「文集」為單位所產生的另一個問題：三千二百餘篇文章，並不是每一篇只有一個主題；而是往往都有兩個或以上。像倪岳（1444-1501）《青谿漫稿》會議一文，討論的問題，涉及銓政、倉儲、商稅、刑法、太學、軍器、治安、講學、宗藩、內供、宦官等共十二項問題，因此朱士春編「分類目錄」時，上述這些類目下都查得到會議這篇文章。其餘像桂萼（?-1531）《桂文襄公奏議》修省十二事疏、應制條陳十事疏二文，霍韜（1487-1540）《霍文敏公文集》天戒疏一文，徐恪（1431-1503）《徐司空奏議》修政弭災疏一文，都是屬於一篇之內討論七、八項以上的問題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當讀者或研究者要將相關的問題歸納出來時，必然遭遇到無法完整地歸類的困難。這種結構性的現象其實並不難理解，因為國家的問題，雖可區分為經濟、軍事、內政、田制等等各個部門，但這些部門的問題其實也是相關的，是互相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所以進呈奏疏的士大夫，無法只就單一的問題提出興革意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 關於「《文編》給予清代的經世思潮什麼啟示」這個問題，本計劃在提出的時候，本人已指出應該將之區分為兩個層次，分別論述。第一、是《文編》所收錄文章的作者的經世理念，給予清代經世思潮的啟示；第二、是《文編》的編者的經世理念，給予清代經世思潮的啟示。關於第一點，《文編》蒐羅弘富，網羅了大量極精彩的文章，足以顯示有明一代的士大夫，對「經世」的實務問題，思慮其實非常周延。《文編》收錄了很多對於官制、用人、軍事、邊防等有極為精闢建議的文章，作者對於國家、社會、邊防、地理、掌故、人口，甚至經濟、環保等各種問題有很清晰及詳細的認識，立論亦非鑿空。我舉一個例子說明：《文編》補遺卷四收錄錢榷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為築堡，討論的是內地築堡可能性的問題，是其他關於「城堡」的文章所未及討論的（雄按：《文編》中關於「城堡」的文章，大多從邊防的角度討論的）。作者首先論證「堡法可施之邊陲，不可施之腹裡；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而緊接著列舉二十五個理由，扣緊地理、差役、農業、糧餉等實際問題，一一疏辯立論。過去學術界許多人認為明朝人空疏，這個論述的有效性，恐怕須要重新修正。清代初年講經世之學的學者如顧炎武，所著《日知錄》即針對了明朝尤其是晚明政治、社會、經濟等實務問題而作出討論。這一點，何佑森師在清代經世思潮一文（《漢學研究》總 25，1995 年 6 月，p.4-5）已經列出十七條證據，證明了《文編》與《日知錄》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仍要指出，《文編》這一類的文章有些顯然是出自老練的技術官僚之手，所以這一類的文章絕大部分都只「橫」向的考慮，而沒有像顧炎武著《日知錄》那樣「縱」向的將一個當時的問題向經書和史籍裡面窮溯、印證。這是明朝學術風氣「窄化」（雄按：所謂窄化，是針對明朝官學與私學都有疏忽經書史籍的情形而言）的趨向，也是《文編》所顯示明朝經世思想的一個基本限制。
8. 關於第二點「《文編》的編者的經世理念，給予清代經世思潮的啟示」的問題，首先，師範大學史所 1986 年碩士論文作者許淑玲在他的《幾社及其經世思想》中曾提出一個論點，就是幾社文士認為三代為盛世，秦漢以降為衰世；明朝初年為盛世，明中葉以降為衰世。我認為，這一觀點的前半部分，其實是流行於明末清初的崇古抑今的歷史觀；後半部分，則出自明代政治人物習慣的推崇祖法的理念。總的來說，當時知識分子論政治改革，往往藉由「崇古抑今」的手段，推論出「以

古革今」的目的。我在上文第 3 節已經指出，《文編》對於明朝前後期文章的收錄，基本上是「前略後詳」，表示在編者的觀念中，與其多收錄明朝初年亦即盛世時期的文章，不如多收錄明朝中葉以後反映國家衰亂的時代問題的文章。換言之，幾社三位文士編《文編》，並不是像黃宗羲《待訪錄》、顏元《四存編》那樣，要提出一套往古的理想制度來改革現狀，而是強調讀書人要認真面對問題，從明朝政治歷史人物處理國政問題的經歷中，汲取經驗。因此，我不認為編者有刻意藉由《文編》來突顯一套經世的理念，而認為他們是傾向於喚起晚明士人少花時間舞文弄墨，多注意現實問題。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

9. 編者以極短的時間（八個月）將三千二百餘篇文章編集起來，只加入「行批」，作為字裡行間的解釋；至於起碼的分類工作，編者都沒有做，也沒有具體地指出這些蒐錄的文章其整體性如何，因此，我們認為《文編》反映出編者「經世」的觀念，既不完整亦不清晰，只能說有約略的認識。最明顯的例證，是作者在討論所有國政的問題時，都採用了較寬鬆的標準，將各種不同的意見盡量收入。若從墨子、黃克武二人所喜歡用的「調適」和「轉化」兩個觀念來說（「調適」近於「調和」的意思，「轉化」則近於「改變」的意思），我認為三位編者還談不上有「轉化」思想，「調適」的意思倒還有一些，但仍不明顯。主要問題在於，三位編者編輯的時間非常短，他們編書的主要企圖，毋寧是要鼓勵士人多注意政治實務的問題，從「實務」之中學習。所以，他們在選文時，多是正反兩面的意見都收錄。這一點，我們在閱讀《文編》時明顯地注意到，吳 影印序 也早已提出了。茲不贅論。

10. 其次，徐孚遠 序 特別提出「本朝故實」，但該書體例，同樣為討論「大禮議」的文章，分散在各卷，互不相應；其他相同論題的文章亦如此。倘若編者真要藉這三千二百餘篇文章來保存朝章國故，這樣散漫的體裁，又如何能讓讀者了解一代故實呢？他又說「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然而，憲章當代，若不能以歷史上「百王」的經驗來比較印證，「經世」這個理念始終是不完整的。相對之下，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 與從子貞一書 中指出：「吾之所謂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這是一個對「經世」非常清晰的定義，比較起來，《文編》反而較接近「經濟」的意義，因為這部書並沒有做參酌「古今經國之大猷」的工作。其三、《文編》收錄了一些「災異」為題目的文章，共計七篇，如卷四十八《彭文憲奏疏》的 災異陳言疏 ，以「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為理由，提出改革時政的意見；甚至有一些溺於迷信的文章，例如卷三十五《朱簡齋先生奏議》的 請趨吉避凶疏 ，內容竟大談陰陽五行、龍虎玄武的風水理論，以議論皇城形勢。這樣講「經世」，與宋代儒學及清代儒學思潮中以人文關懷為主體精神的經世傳統，是相悖離的。這些文章的收錄，也顯示編者「寧濫毋缺」的心態，說明了他們「經世」觀念的模糊。

11. 另一方面，我們指出編者三人對「經世」理念不甚清晰，並不是要否定他們以及《文編》的價值。事實上，這個問題必須要返回當時的歷史情景，才能看清楚。在晚明眾多的社黨中，有些是以論學而論政的，如東林黨；有些是科場文士與在朝官員互相結納而成立的，如復社。而「幾社」的士大夫，則注意到將明朝一代典故奏議編集成冊，以扭轉「士無實學」的弊病，並提供國史採擇。《漳州府志》

卷 50「紀遺」亦記述：「徐孚遠，華亭人，雲間六子之一。明亡入海，嘗遊郡中，士人經其題拂，皆勝流俗而有實學者。」《廈門志》稱：「當明之季，江左社事最盛，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這些方志史乘的根據，除了陳子龍、徐孚遠的節操事功表現外，基本上還是《文編》這部書。換言之，《文編》一書奠定了陳、徐、宋三人「經世學者」的形象，亦可見《文編》在晚明時期的影響力及受重視的程度。另一方面，陳子龍序批評當時文壇的風氣：「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他注意到天下才智一天不如一天，問題出在很少人去訪求關涉世務所急、是非得失的政治文章。這可見他們編《文編》，實具有遠大的教育和轉變風氣的目的在。又宋徵璧稱《文編》蒐錄「治體事功，人文國典」，以為「異日作史之資」，按陳寅恪曾說：「昔元裕之、危太僕、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污，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幾社文士能具有這種保存國史的思想，即屬於陳氏所說「史不可滅」的精神，這亦是《文編》的讀者所不可不探究的。

12. 至於本計劃希望解決的第四個問題為：我們是否能透過《皇明經世文編》重新探討明代學術思潮的特質與相關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見於上文的分析。我們主要認為，《文編》具有啟蒙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幾點得到證明：第一、《文編》詳於明朝後期而略於明朝前期，顯示編者主張「經世」應該多注意現實問題和時人的解決方案，少些用古代聖王制度來建構空中樓閣式的理論。這是有別於稍後（明末清初）講經世的學者（其中有些甚至主張恢復封建）的價值取向。第二、《文編》中所顯示的編者的經世理念，嚴格而言並沒有具體而清晰的內容。作者透過各部文集選取文章，除了藉由個別文集中特殊的人物（如王守仁）集中特殊的課題（如平宸濠之亂）之外，限於全書體例，無法突顯編者心中的一些經世的重要理念。第三、從該書若干選文的標準來看，如對於災異、風水一類文章的收錄，也顯示作者並沒有將「經世」的理念，規範於嚴謹的人文的層次，較諸稍後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等的關懷人文、不涉迷信的科學精神，實為遜色。第四、從《文編》中所收錄的文章可見，明朝士大夫對於政治運作、調和、改革等，其實有非常周延的思考，但卻很少像宋代士大夫那樣參酌古代經典王制的精神，充分顯示明朝士大夫經典素養的薄弱，但也反映他們當中有很多是政治經驗極為豐富、經史學問卻未必豐富的技術官僚。他們的文章所合組成的這部《文編》，反映的經世思想，因而也比較缺乏一個遠大和宏觀的歷史視野。第五、《文編》編訂於崇禎十一年，後明朝邁入衰亡，「經世」思潮風起雲湧，顧炎武、黃宗羲諸人討論政治、風俗、經濟、地方政制等問題，實多受《文編》的啟發。
13. 我們在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假台灣大學中文系會議室，針對本計劃及「經世」思想相關的問題，舉辦了一次小型的研討會，兩個小時的討論，除了由我針對計劃執行狀況做口頭報告外，與會者大致上又獲得兩點結論：第一、我們認為晚明時期的經世思想是有一些特殊性的，例如當時的儒家思想摻雜有佛道思想，經世思想也不例外。謝明陽先生舉禪師覺浪道盛（1592-1659）為例，說明當時的方外之士有「出世亦可以經世」、「經世未必見諸行事」的思想；錢澄之（1612-1693）《田間文集》卷四 與食亭禪師論莊子書一文則說「莊子固有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學」，這個考慮，幫助我們能從《文編》以外的整個時代背景為範疇，去思考當時

經世思想的相關問題。第二、過去討論中國明清經世思想的學者，從顧炎武、黃宗羲、萬斯同、張爾岐等儒者的著作中著眼較多，以致往往將「經世」視為與儒家思想最密切。但我們認為《文編》中的「經世」思想，不應該被視為僅僅是儒家思想的一個環節或者部分。從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因為其書涉及農業、軍事、法律等各方面，與諸子百家學說中的農家、兵家、法家等各派思想都有關係。這一點，蔡璧名教授和陳琪薇先生都特別提出。蔡教授還從中國思想史上「感應」的觀念，指出「中國人一直在尋找一個能夠通於各個領域的道理」，「經世」亦然。這樣說，明末清初時期的經世思想，首先就不能將宇宙論排除在外，也不能偏於一家學說（如儒家）這兩個結論，使我們能有另一個更寬廣的視界去看《文編》，給予我們的幫助很大。

14. 關於如何進行研究的方法問題，計劃的審查人之一特別提出一個意見，認為「應立足於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採取一個研究角度來分析其思想內涵」。然而我在提出計劃時已經考慮到，本計劃是一個針對原始文獻所作的「基礎研究」，有別於其他應用的、或進一步進行更高層次探究的研究工作。因此，應該以研究原始材料本身為主體。如果以學術界現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那麼計劃名稱和範疇就勢必要修改為「《皇明經世文編》與晚明的經世思潮」，而這個題目，並不是現階段我要做的工作。不過為表示尊重審查人此一意見，我也著意蒐集和整理了二十世紀學術界關於晚明及前後期經世思想的論述，補充了丘為君、張運宗於1996年合撰的「戰後台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7:2, p.181-229）一文。

五、計畫成果自評

1. 精確地評估，本計劃獲得的成果，大約達到當初預訂目標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左右。按照預訂進度甘梯圖，原本計劃「閱讀資料、訂主題、定年代」共六個月，結果閱讀資料進行了一年尚未讀完。「編輯、輸入資料，做成統計表」則用了四個月，與預訂時間差不多。「分析資料，統計結果」再加上評估各項問題，共用了六個月。「撰寫報告」則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逐步寫成。
2. 本計劃提出的時候，本人已在「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一節中指出，計劃執行可能遭遇的困難，「最主要在於時間掌握不容易十分準確，因為《文編》文章數量龐，範圍極廣，完全掌握進度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我預訂的進度，是每星期完成二十卷為度。現在我必須承認，執行計劃的經驗尚未足夠，當初訂定這個進度確實太理想了些。這項閱讀的工作，主要由我和助理呂敏慧小姐共同進行。在執行時，我們時常落後於進度。總的來說，我們閱讀這三千多篇文章，實際精讀的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的只能略讀。目前本計劃已經執行完畢，但我們仍持續地關心這批材料，繼續閱讀尚未完成的部分。
3. 上述落後進度的原因，除了經驗不足外，還有兩點，其一是在判讀這些原始材料時，我們遭遇到了若干的困難。基本上，我和呂小姐都是中文系出身，受過古文解讀的訓練，閱讀的速度不算慢。然而，很多文章的作者只是技術官僚，行文論述既不清晰，我們在閱讀時有時為了確定文章的論點，往往須要仔細進敲，這樣一來便拖慢了速度。此外，也有些文章篇幅很長（如倪岳 會議），閱讀不易終

篇。其二，是我們最初想利用朱士春的「分類目錄」，和每篇文章對照印證。但朱氏目錄分類太細，我們消耗了許多時間在尋繹類別與類別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我們發現「政治類」屬於「外交」的文章，往往和「武備類」屬於「邊防」的章章互有關係；「皇室類」屬於「宗藩」的文章，和「政治類」屬於「禮樂」的又有關係。至於「政治類」屬於「總論」的文章，與其他各類別的問題具相關性，就更不用說了。我在這裡特別提出上述這兩點，供學界同仁卓參。

4. 以一個「基礎研究」而論，雖然全書只完成了部分精讀、其餘粗讀，但整體上的成果，我仍然認為是豐碩的。首先，這篇「成果報告」「結果與討論」所列出的十四點，等於是本計劃成果最菁華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對於《文編》以及三位作者的相關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究。另一方面透過這一年來直接的閱讀和考察，我自己對明代「經世」思想的相關問題，有了更為深入的認知，未來可以將之與清初經世思潮作出聯繫。《文編》原以「文集」為單位，使我們極不容易看出整個時代的問題，編者的「經世」理念因而也十分模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將整批材料描畫出一個外貌、基本線條以及特質。《文編》基本架構、體例、作者的資料、選文的寬嚴、編者的理念等，我們都有頗為充分的掌握。
5. 為了查核全書四百二十九位作者的個人資料如：名、字、生卒年、所著文集名稱（偶與目錄所列名稱不同）等資料，呂小姐耗費不少時間用在查證和前後比對。直至計劃執行完畢，仍有某些作者的資料並不完整，包括史料對於他們的名、字有兩種以上不同的記載，或者生卒年有異文、疑問等等。目前雖然計劃已經執行完畢，我們仍在繼續查核的工作。

六、參考文獻：專書

1.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
2. 《明經世文編》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3. 《明清實學思潮史》1-3冊，濟南：齊魯書社，1989。
4.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
5.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台北：臺灣銀行。
6.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台北：臺灣銀行。
7. 《福建通志》，台北：華文出版社，1968。
8. 《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30種，台北：臺灣銀行。
9. 《同安縣志》，台北：福建省同安縣同鄉會，1986。
10. 《金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80種，台北：臺灣銀行。
11. 姜亮夫，《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12.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13. 容肇祖，《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 龔鵬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書局，1983。
15. 孟森，《明清史講義》，台北：里仁書局，1982。
16.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台北：南天書局，1987。
17.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台北：南天書局，1987。
18. 陳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書局。

19. 詹海雲，《清初學術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七、參考文獻：論文

1. 王爾敏 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
2. 何佑森 清代經世思潮，《漢學研究》13:1，p.1-14。
3. 何佑森 明末清初的實學，《臺大中文學報》4，p.37-51。
4. 山井湧 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史學評論》12，p.141-157。
5. 林聰舜 傳統儒者經世思想的困境——從明清之際的顧、黃、王等人談起，《哲學與文化》14:4，p.47-58。
6. 丘為君、張運宗 戰後台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7:2，p.181-229。
7. 黃克武 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p.83-96。
8. 李紀祥 「經世」觀念與宋明理學，《書目季刊》23:3，p.30-40。
9. 林保淳 舊命題的全新架構——明清之際的經世思想，《幼獅學誌》19:4，p.170-192。
10. 鄭吉雄 萬斯同的經世之學，《臺大中文學報》8，p.195-217。